

4.2.16 余承法. 全译本质“化”论, 中国外语, 2016 (2)

全译本质“化”论<sup>①</sup>

余承法 中南民族大学

**摘要:** 结合全译的新定义, 基于钱锺书对“化”的独到诠释, 将“化”定义为: 译者为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 得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过程和结果。“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值的再现。因此, “化”不仅是全译转换的精髓, 更是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关键词:** 全译; 本质; 化; 原文; 译文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 (2016) 00-0090-06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2.012

## 1 引言

全译作为一种翻译类型, 是“人或/和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黄忠廉, 2012), 旨在转移原文的语义内容, 更换或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 化解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言多意”式矛盾。全译是原文内容渐化、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 行为的落脚点在“化”上。该“化”与哲学之“化”有何关系? 哲学之“化”如何用作译学范畴? 如何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本文试图做出回答, 以求教于方家。

## 2 “化”的内涵诠释

文字学之“化”的基本含义是化生、变化, 有贯通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神用, 体现于文艺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构成文艺学的一个独有审美范畴。钱锺书(2002: 77)从许慎关于翻译的一段训诂出发, 揭示翻译所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 用着墨不多的文字道出译艺之“化”的基本内

涵: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艺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去痕、存味”, 这正符合“化”的基本含义。就“变化”义而言, 全译首先表现为语形的有形变化(更换原文形式), 其次表现为语义和语用的无形变化(转移原文内容、保存原文风味), 前者是外在、次要的, 后者是内在、根本的。钱先生提到“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时, 使用了“化”的“有形变化”之义, 在谈到入于“化境”时, 使用了“化”的“无形变化”之义。他赞同荀子对“化”的哲学解释: “状变实无别而为异者, 谓之‘化’”, 并从形与神的关系提出对“化”的独到见解: “盖状变形改之‘化’, 是处即有, 夫人尽睹……; 且金就形论形, 亦未尝思出其位, 旁及于形与神智离合也”(钱锺书, 1979: 472)。就“化生”义而言, 原文经过译者的原语理解、语际转化和译语表达三个阶段, 发生语形的有形变化和语义、语用的无形迁移, 生成“状变实无别”的译文, 即“躯体

作者简介: 余承法, 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学、中外语言比较。E-mail: victoryu2006@126.com。

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同时参与译语文化的生命构成,即“化生”译文。

钱锺书(2002:77-79)标举“化”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时,也坦言“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化”“讹”同源同根,“化”加“言”即为“讹”,“讹”去掉虚假之“言”即为“化”。《说文解字》中无“讹”有“吡”,“吡”即“动也”,“讹”为俗字,“化”有变化、变动之义,变动可能导致虚假和不实。钱先生悬出“化”的最高理想,从艺术审美的高度为译者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认为有些“讹”尤其是译者创造性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译文因此得以免于全被淘汰(同上:87)。译者通过引诱、避讹、求化、打通一系列过程,帮助原文获得生命的丰富、拓展和延续,此种“讹”更是另一境界之“化”(余承法、黄忠廉,2006)。因此,“化”中有“讹”,“讹”中显“化”,二者“背出分训”,共存、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

### 3 “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

全译忠实原文内容,再现其语用价值,化解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帮助译文读者逐渐理解和接受异质事物,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程度的“似”,即信息量极似,包括意似、形似和风格似(黄忠廉等,2009:10-12)。结合全译的新定义,顺着钱先生的思路,本文将“化”定义为:译者为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得原文之意、存原文之味、成译文之形的双语转换为。这一定义跟“化”的文字学原解(教化、变化)、哲学通解(渐化、化生)、美学专解(物化、化境)和钱先生自解(去痕、存味)一脉相通,落脚于化解双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贯穿于全译行为的始终。下面将从全译的理想与标准、目的与手段、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价值与使用价值五个方面论证“化”如何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 3.1 “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

钱先生在1964年将“化”标举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1979年之后改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这一改动导致译学界对“化

(境)”持有四种主要观点:“标准说”“理想说”“理想/标准模糊说”和“理想兼标准说”(余承法,2013:55),争论的焦点在于:“化”能否兼作全译的最高标准?最高理想/境界与最高标准之间究竟是否具有可通约性?

钱先生的相关表述清楚表明“化”属于最高理想/境界范畴,这已为大多数人接受,即使是“标准说”支持者也无异议。有学者认为“化”是最高理想而非最高标准,如:许建平(1997)认为钱先生不在为文学翻译提出一个标准模式,而是揭示译者追求的理想境界;陈福康(2000:419)认为“化”的本意并非将其视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而是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朱宏清(2001)、欧阳阳锋、尚敏锐(2002)、黄汉平(2003)等认为化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葛中俊(2007)区分了“翻译的理想”和“理想的翻译”,指出前者是翻译实践追求的极限高度,是超乎标准以上的目标,后者是可以达到的客观现实,是标准本身。“标准说”论者如周煦良(1982)、许渊冲(1982)、张今(1987)、朱志瑜(2001)等直接引用《林纾的翻译》早期版本中的相关陈述,将“化”当作最高翻译标准,论证它作为标准的功用、评析译文的依据、指导批评的尺度。辜正坤(2005:105-106)认为“化境”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需要构成一个标准系统才能有助于翻译实践。

翻译标准归根结底来源于翻译的定义,二者是流和源的关系(黄忠廉、李亚舒,2004:228)。翻译分为全译和变译之后,翻译标准也相应地分为全译标准和变译标准。判断全译求“化”成功的标志是“译本对原文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锺书,2002:77),这是“化”的审美要求,因此可视为全译的最高标准。“化”的可操作性在于译文对原文“得意忘言”“形变实存”“量变质保”,有众多出神入化的译文作为事实证据,也有些研究“化(境)”的论著作为理论依据。

对于“化”是全译的最高理想还是最高标准,有些学者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刘靖之(1981:1-15)、罗新璋(1984:1-19)、郑诗鼎(1997:70)、王宏印(2003:177-193)有时将“化境”当作翻译标准,有时视为理想境界,或者交替、并列使用“境界”和“标准”。少数学者认为“化(境)”可兼作翻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如:余承法(Yu,2006)认为:“化”既指译

者追求的理想,又可看作翻译实践和批评的标准;王秉欽(2004)、余协斌等(2004)指出:“化”既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译者追求的最高目标;陈大亮(2006)强调“化”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境界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杨全红(2008)明确“化境”既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又兼作最高标准,但他没有回答二者之间能否通约的问题。

辜正坤(2005:83)指出,不仅有多层次读者,也存在多层次译者,每个层次对译文都有特定的评价尺度,因而导致翻译标准多元化。基于翻译艺术的高低,可将译者大致分为翻译家(翻译大师)和普通译者(包括高级译者、中级译者和初级译者)。翻译家以深厚的职业素养、广博的知识结构、高超的双语功力、成熟的转换艺术创造名篇佳译,在他们妙笔生花的译文中,既能达到作为最高标准的“化”,也能实现作为最高理想的“化”,标准和理想成功地合二为一。普通译者以“化”作为最高的理想追求,尽力消除三种距离,即:译文与原文在语言、文字、文化方面存在的距离、译者的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之间的距离、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之间的距离,从而达到人与译同化、心与手一致。尽管全译的理想追求和实际操作之间还存在一段很长距离,创造由“讹”向“化”的译文尚需不懈的艰辛努力,但“化”的最高理想并非海市蜃楼,“化”的最高标准绝非高不可攀,译者的不断实践是通向“化”之理想的不二法门,众多高质量的译文是实现“化”之标准的试金石。

总之,“化”字“并行分训”,兼含全译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的双重功能,既指向全译实践,又指向全译批评,具有实践指导性和示范性,能够提高译文质量、推动译才培养。“化”作为全译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的通约性体现在从初级译者向中级译者、中级译者向高级译者、高级译者向翻译家的角色嬗变历程之中,体现在从误译到正译、从普译到佳译的精益求精的艺术创作过程之中,二者存在理论上的关联性和实践中的递变性。

### 3.2 “化”是全译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翻译是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复杂活动”(Nord, 2001: 13),翻译目的可分为三类:译者的基本目的、译文的交际

目的、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达到的暂时目的。目的论者除运用skopos(总目的)之外,还使用了aim、purpose、intention、function等几个相关概念:aim(目标)是翻译行为要达到的最终结果,purpose(目的)指达到目标过程中的阶段和结果,function(功能)指译文受众心目中文本意在传达的意义,intention(意图)是有目标的行为计划,包括译者有目标地化生译文和受众有目标地理解译文。这五个概念中,skopos是类概念,指翻译行为的总目的,其余四个是属概念,指翻译行为的子目的,总目的控制和支配子目的,子目的为总目的服务。

全译的总目的是“化”,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思维模式、运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消除隔阂甚至冲突,构建译者与原文及其作者、译者与译文及其读者、译文与译文读者之间圆通共融的和谐状态。全译的直接目的是忠实原文,尽可能保存其信息内容和宏观形式,求得译文与原文极似,通过消除译文和原文微观的语言层面上的差异,确保原文的量变质保。全译的终极目的是“打通”,即:中西打通,古今打通,文字、文学、文化、学科打通,实现语言壁垒的贯通和人类文化的互文,最终建造人类文明的“巴别塔”。“化”作为总目的,是全译行为的统领和核心,决定整个活动中的诸多因素,既关涉全译标准的厘定和理想的追求,又体现战略的部署和机制的确立,最终落脚于决定策略、选择方法和运用技巧,是全译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是一切全译行为的起点和归宿。

求“化”手段指译者为实现译文“去痕、存味”的目的而运用的工具、操作程序、方法技巧的总和,工具是指甲乙两种语言(即原语和译语),操作程序即为原语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操作方式是指对原文基本单位如词、短语、句、段、语篇等的处理,包括直译和意译(处理语言差异)或归化和异化(处理文化差异)两大全译策略,以及对译、增译、减译、移译、换译、分译、合译七种全译方法,以及针对不同语境中不同语言单位的具体处理而采用的三十余种全译技巧,从而构成完备的全译方法论体系(余承法, 2014: 16)。

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既是一个翻译问题,

也是一个哲学命题。一方面,全译的求“化”目的和手段相互区别、相互对立,“化”之目的和求“化”手段以其独立形态存在,二者不容混淆。“化”作为目的是译者根据原文内容和读者需求主观设定的,必须依靠现实条件作为前提,其总目的和终极目的是长期的,但具体目的或直接目的是短暂、易逝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与之不同,求“化”手段是客观存在和实际运用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长期运用的。另一方面,“化”之目的和手段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目的决定方法”,“化”之目的必须借助一定的求“化”手段才能实现,具体目的决定相应的求“化”手段,设定目的是为了考证其实现途径和手段的可行性,没有不采取求“化”手段就能达到的“化”之目的,正如诺德(Nord, 2001: 15)所言,“翻译是一种受目的驱动、以结果为导向的人类互动行为”。与此同时,求“化”手段首先是为了实现“化”之目的,没有不为实现“化”之目的而采取的求“化”手段,即使偶尔存在这样的手段,也是极个别情况下特殊的运用手段。因此,“化”之目的和求“化”手段均以对方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共处于全译实践之中,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 3.3 “化”是全译主体与客体的融合

全译主体是指参与全译实践的人,有时也包括作为人类智力延伸的机器,分为直接参与者(译者)和间接参与者(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核心主体是译者。一方面,译者是求“化”的主体,兼任原文读者、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和协调者、译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所有本领都体现在循规蹈矩而又游刃有余地施展“化”术:消化原文、变化形式、化解矛盾、化生译文、物(原文和译文)我(译者)同化。在从隔到不隔、不化到化的颠顿风尘中,译者既可能承受“叛逆者”的恶名,又可能赢得“创造者”的美誉,于是“创造性的叛逆者”是其受之不甘的尴尬形象。“译者若能如学者般独立的学术思考理解原文,兼有作家沉着的艺术创造再现原文,以评论家敏锐的洞察力审视译文,则有可能进入自由的审美之境、凝神冥想的创造之境和至善至美的翻译之境”(余承法, 2006),这是求“化”主体的译

艺追求。另一方面,译文读者是悟“化”的主体,既是求“化”艺术的感受者,也是译文的评判者,高悬“化”之宝剑,对入“化”译文赞叹有加,对食而不化、化而不合的译文口诛笔伐。既然译者是一类特殊读者,读者对译文的审美要求也就自然体现在译者的求“化”过程之中。

全译客体是全译实践的对象,包括作为认识客体的原文和创作客体的译文。原文是全译活动的起点,首先进入译者的认识世界,译者必须跨越时空,进入忘我境地,融自身于原文的创作语境,透彻理解原文语形所体现的语义、语用及其反映的语言现实、文化背景和主客观世界。译文作为全译活动的终点,是双语转化之后的化生对象,译者必须实时调整角色,从用原语思维转化为用译语表达,融入译语反映的文化图景、思维模式、风俗人情、社会百态,用适当的译语形式表达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力争译文成为了无痕迹的文本生态。

“化”是译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阶段,表现为认识差异、创造不已和诚明以信(彭发胜, 2006)。在求化和打通的过程中,文本意义呈现非线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译者必须让原文意义融化在其意识之内,尽量做到忘我以充分理解文本意义,这种行为即为西方哲学中的“悬置”,与孟子《万章上》的观点不谋而合:“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中国诠释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以意逆志”是指读者根据自己对文本的充分解读,去逆推作者的心理状态及其相关语境因素。

因此,在原文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译文读者的全译主客体链条中,译者跟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循环互动,以译者跟原文作者对话、转化表达原文为主,以原文作者间接参与和读者赏析译文为辅,共同推进全译艺术尽善尽美。译者穿梭于原文和译文,融原文于其意识之内,以内心空无的状态化出译文;读者充分解读、完全融入译文,在清明透彻的不隔译文中逆推作者的心境和原作反映的原语世界,进入主客融合、物我同化的艺术高境。

### 3.4 “化”是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

全译求“化”的首要条件是求“信”:“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

(钱锺书, 1979: 1101)。入“化”的译文, 必须求信于原文内容, 求真于原文风格, 跟原文处于一种不隔、透明的状态, 自身必须具备透性, 确保一个语言世界中的读者借助译文认识另一个语言世界时, 并不感到译文的存。同时, 求“化”也是为了造美。译者忠实原文并不是要亦步亦趋、矫揉造作, 而是在对原文融会贯通的前提下, 通过自己的审美判断和选择, 对原文进行艺术再创造。“化”强调译作的审美艺术效果, 认为译作是原作的“投胎转世”或“脱胎换骨”。许渊冲、许钧(2001: 46-59)认为: “求真低标准, 求美高标准; 真是必要条件, 美是充分条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 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真与美的统一即为“化”, 既能不因语文学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既能解决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一意多言”式矛盾, 又能解决译文跟原文“信言不美”与“美言不信”的矛盾, 因而成为原文在译语世界中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

### 3.5 “化”是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值的再现

原文价值是作者凝结在艺术创作中的无差别劳动, 其使用价值是原文能够满足读者阅读、欣赏和使用的属性; 译文价值是凝结在译文中的无差别劳动, 既包括作者的原创性劳动, 也包括译者的二度创作行为, 其使用价值是指译文能够满足译语读者阅读、欣赏和使用的属性。因此, 译文价值包含并再现原文价值, 译文的使用价值折射并近似原文的使用价值。

全译行中, 求“化”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共融, 使原文经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在译语世界获得“来世”, 确保译文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输入原文的价值, 并彰显自身的使用价值, 帮助译文读者获得跟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满足相同的需求。既然全译之“化”旨在化解语际内容与形式的矛盾, 求得译文与原文的极似, 缔结文字、文学、文化姻缘, 那么全译行为的最终社会效应就是让原文与译文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共同体现于作者和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以及读者需求的艺术追求之中, 体现于原文内容渐化和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与结果之中, 成为价值的和合体。

## 4 结论

钱先生意识到“化”字本身“并行分训”, 挖掘出哲学之“化”的科学内涵, 体悟到艺术之“化”的无穷魅力, 对文字学之“化”做出独到的译学界定, 完成了对“化”的理性提升、概念移植和范畴转换。基于此, 本文将全译之“化”定义为: 译者为了消除语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意多言”式矛盾, 得原作之意、存原作之味、成译作之形的双语转换行为过程与结果。“去痕、存味”是译艺之“化”的总体特征, 这与文字学之“化”的基本含义吻合, 与哲学之“化”的内涵一致, 与文艺之“化”的追求相同。宏观上, 坚持全译观念追求“化”, 转移原文意义实施“化”, 再现原文价值体现“化”; 微观上, 全译目的决定“化”, 全译手段展示“化”, 译者实践促成“化”, 读者审美需要“化”, 全译过程贯穿“化”, 全译结果验证“化”。总之, “化”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内容求信与形式造美的结晶、原文价值与译文使用价值的再现。因此, “化”不仅是全译转换的精髓(余承法、黄忠廉, 2006), 更是体现为全译的本质。□

### 注释

-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13FYY008)和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专项基金项目“语言类型学视域中的惊讶范畴研究”(CSY15015)的阶段成果。

### 参考文献

- [1] Nord, Chir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13; 15.
- [2] Yu, Chengfa. On Qian Zhongshu's Theory of "Sublimity"[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6,14 (3): 214-229.
- [3] 陈大亮. 重新认识钱锺书的“化境”理论[J]. 上海翻译, 2006(4): 1-6.
- [4]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

- 语教育出版社, 2000: 419.
- [5] 葛中俊. “化境”背后: 钱锺书的文本价值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150-153.
- [6] 辜正坤. 译学津原[M].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05: 83; 105-106.
- [7] 黄汉平. 文学翻译中“删节原作”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兼论钱锺书《林纾的翻译》[J]. 中国翻译, 2003(4): 26-29.
- [8] 黄忠廉. 翻译新解——兼答周领顺先生论“变译”[J]. 外语研究, 2012(1): 81-84.
- [9] 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12.
- [10] 黄忠廉, 李亚舒. 科学翻译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28.
- [11] 刘靖之. 翻译论集[C].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1: 1-15.
- [12]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19.
- [13] 欧阳利锋, 尚敏锐. 以西方观点解读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J]. 语言与翻译(汉文), 2002(1): 44-48.
- [14] 彭发胜. 融通化生——翻译过程的现象学描述[J]. 中国翻译, 2006(5): 29-36.
- [15] 钱锺书. 管锥编(1-5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101; 472.
- [16] 钱锺书. 七缀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77-114.
- [17] 余协斌等. 钱锺书的翻译理论与西语雅译[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46-49.
- [18]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77-193.
- [20] 许建平. 钱锺书“化境”说新释[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1): 91-93.
- [21] 许渊冲, 许钧. 翻译: “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A]. 许钧等.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C].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46-59.
- [22] 许渊冲. 扬长避短, 发挥译文优势[J]. 翻译通讯, 1982(4): 19-22.
- [23] 杨全红. 化境: “理想”耶? “标准”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1): 98-103.
- [24] 余承法. 释“化”[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73-75.
- [25] 余承法. 全译求化机制论[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26] 余承法. 从全译之“化”看变译之“变”[J]. 外语学刊, 2014(1): 99-103.
- [27] 余承法. 全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28] 余承法, 黄忠廉. 化——全译转换的精髓[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89-93.
- [29] 张今. 文学翻译原理[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118.
- [30] 郑诗鼎. 语境与文学翻译[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70.
- [31] 周煦良. 翻译三论[J]. 翻译通讯, 1982(6): 1-8.
- [32] 朱宏清.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锺书先生的翻译观[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103-105.
- [33] 朱志瑜.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神化说”(前期)[J]. 中国翻译, 2001(2): 3-8.

#### On “Sublimation” as the Essence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definition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Qian Zhongshu's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 “hua” (“sublimation/sublimity”), the present paper defines “hua” a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a bilingual transformational activity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tries to maintain the meaning and flavor of the source text (ST) and create the target text (TT) by handl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ame ST meaning and corresponding different TT forms. It then elaborates the fiv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that is, “hua” as the commensuration between the ultimate ideal and highest standard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the unity of end and mean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ursuing faithfulness to the ST and creating beauty in the TT,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T value and TT value in use.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essence; “hua” (sublimation/sublimity); source text; target text